

# 平衡經濟成長與公平正義中之政黨角色分析：以西班牙社會勞工黨為例

---

## The Role of Political Party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quality: Reform of the Labor Market during PSOE Government in Spain (1982-1996)

黃曉薇 *Huang, Hsiao-Wei*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生

*PhD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呂建德 *Lue, Jen-Der*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摘要 / Abstract

經濟全球化與福利國家間的關係，一直受到各界學者重視與矚目，根據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國家應該保證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國營企業的私有化、彈性與浮動的匯率機制、減稅、勞動市場的去管制化、移除所謂勞動市場僵固性的福利改革。然而，相對於福利的刪減，Rodrik 則著重在國家可能會暴露於世界經濟景氣循環的變動，以及伴隨整合進入全球市場後帶來的外

部風險。這些外部風險可能使得許多經濟弱勢團體（例如低技術勞工）更容易遭受到經濟動盪的傷害。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必須發展許多福利方案來緩和、減輕來自於國家經濟系統開放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在經濟開放和公共經濟的擴張、政府盈餘、尤其是社會福利系統的擴張之間是存在著正向的關係。西班牙屬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新興的民主國家，在民主化初期，社會勞工黨（PSOE）執政期間同時採取擴張性的財經與社會政策，並維持了將近十餘年的執政地位。政黨的意識型態與偏好，是影響社會政策很重要的變項，社會勞工黨如何達到經濟成長與社會福利保障增加的目標，是本文主要探討的問題意識。研究初步發現是政府採取與工會協調薪資抑制，以及施行供給面取向的總體經濟策略，使西班牙在民主化初期達到上述兩個目標，並順利在 1986 年加入歐洲共同體。不過，薪資抑制政策要有效持續，必須有賴於強而有力的工會組織。

The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welfare states have been paid attention to and attracted attention by the scholars. According to the view of new liberalism, the state should guarantee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privatization, elasticity and floating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tax reduction, the deregulation of labor market, etc... But relative to welfare reduction, Rodrik focused on that the state may expose on the circ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external risk brought after entering the global market. These external risks may make a lot of economic disadvantaged minorities (for example low-skilled labors) who suffer from the turbulent economy. In such cases, the state must develop many welfare schemes to lighten the reverse influences. Therefore, it should exist a surplus relation between the open economy and expansion of social welfare system. Spain belongs to the new developing democratic state i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On the initial stage of democratizing, the social labor's party (PSOE) adopts expanding economics and social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while in power. Ideology and preference of the

political party are the important variables of affecting social policy. How could PSOE achieve the goal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welfare expansion under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f politics? It is the main problem consciousness in this essay. The preliminary finding is that the PSOE government adopted a policy of mutual restraint between government, employers and trade union. Besides, PSOE implemented the supply-side economic strategy made Spain up to above-mentioned two goals on the initial stage of democratizing, and joined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smoothly in 1986. However, if the wage restraint policy can operate effectively, must depend on the powerful trade union systems.

---

**關鍵詞：**政黨、社會勞動黨、社會民主組合主義、勞動市場改革、西班牙

**Keywords:** Political Party, PSOE, Social Democracy Corporatist, Labor Market Reform, Spain



## 壹、前言

根據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國家應該保證去管制化的目標，將限制生產要流動的因素解除，使得這些要素可以有效的在世界市場中配置。具體而言，其中包括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國營企業的私有化、減少貿易障礙、少補貼競爭性較低的工業部門、以有效的合法工具保障私人財產權、彈性與浮動的匯率機制、減稅、勞動市場的去管制化、移除所謂勞動市場僵固性的福利改革。認為當新自由主義的教義在世界各地形成共識和而且被實踐時，加入這個方案的所有國家都將在全球化的長期效應中獲得利益，而在『創造性的破壞』的過程中也許會產生一些負面的外部性效應，但這些負面效應將自然地市場經濟帶來的成長所抵銷。因此他們認為經濟成長的推動是藉由全球化的運行，且將使所有人獲得最好的福利。

從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看來，企業和投資者的生產力增加改變了全球的資本和生產，而在戰後混合經濟下產生重大的轉變。在高度貿易依賴、多國生產制度和全球資本市場的新環境下，在國家若不採取以最低介入的對市場友善的措施(market-friendly measures)，則注定要失敗。此教訓清楚的告訴所有政府，全球市場規則會對民主的選擇強加約束，所謂的好政府是指順應市場政府。

自由主義的教義是被設計作為宣傳的言論，以便說服發展中國家和先進工業化國家的政策菁英來採行去管制化的政策，如同前面所述的去管制化政策，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勞動市場的去管制化，減少福利給付與減稅等政策措施。此外，這些政策被許多經濟跨國組織接受，而且不斷地重複建議作為一種有效的方法來吸引國外投資者。為了爭取國外直接投資和加強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這類組織建議勞動市場應該去管制化以適應變遷的全球生產市場；國家福利應該私有化以減少勞動成本。當遭遇到嚴重的國際競爭壓力時，生產要素的合理化運用、彈性的勞動市場被視為強化全球市場競爭力的唯一方式。自

九〇年代初期，福利方案的削減、勞動市場的去管制政策在大部分的歐洲先進工業國家中，被視為對外部的全球性整合市場的回應方式，而保守主義者和社會民主者將這種方式稱為『第三條路』。

相對於福利削減的分析，一些學者認為全球市場的開放會導致福利的擴張。接續 Cameron (1978) 和 Katzenstein (1985) 的論點，Rodrik (1997, 1999) 著重於逐漸整合於全球市場的國家可能會暴露於世界經濟景氣循環的變動，以及伴隨整合進入全球市場後帶來的外部風險。這些外部風險可能使得許多經濟弱勢團體（例如低技術勞工）更容易遭受到經濟動盪的傷害。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必須發展許多國民福利方案來緩和、減輕來自於國家經濟系統開放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相對於上面所分析的新自由主義福利削減的命題，他們認為在經濟開放和公共經濟的擴張、政府盈餘、尤其是社會福利系統的擴張之間存在著正向的關係。

Katzenstein (1985) 進一步指出，整合進全球市場中意味，一方面國家可能藉由開放市場獲利，另一方面也可能暴露在全球市場變遷的風險中。此外，為了藉由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勞動分工來尋找比較利益，國家必須開始快速的進行工業重構方案，以便能夠適應全球市場不斷變遷的需求。暴露於全球市場中和工業迅速的重構需求是經濟開放的結果，這是小國家與後進工業化國家的生存之道。採取開放策略是必須的，因為可以藉由國外資本和技術的引進，來加強國內企業的個體效率，也可以藉由比較利益的機制來加強全體經濟的總體效率。然而，這個策略可能使得許多勞動者變得更易受傷害，而且使其暴露在失業和低薪的風險中，尤其是對非技術和低技術勞工。因此國家就會處於政策的兩難：到底要更多開放或更多社會保障。根據很多歐洲小國家的經驗，這個兩難並非是無解的。他們發展了許多所得維持和福利方案來彌補因為開放策略而損失的勞動者。社會政策的功能被視為保護性的方案，用來緩和全球市場開放的負面效果。然而，如同之前所提到的，全球化和這些保護政策的關係不能

僅僅從功能主義式的取向來闡釋，我們應該要增加制度因素<sup>1</sup>。

相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削減命題，我們認為社會民主的補償命題也能解釋一部份在全球化時代中勞動和社會政策的制訂過程。國家福利政策功能被視為勞動市場去管制化政策的先決制度條件。問題在於立基於不同國家的制度脈絡下，多大程度的人口群會被含括到社會保障體系，和採行什麼樣的制度形式。

本文試圖以一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新興的民主國家—西班牙為例，分析在民主化初期透過哪些勞動保障政策改革，來平衡經濟發展與平等正義，也就是效率與公平兩個政策目標。

在民主政體中，一般對於政黨行為有兩個不同的概念加以詮釋。一是所謂的政策競逐（policy seeking），二是所謂的職務競逐（office seeking）。Downs(1957:28)認為：「政策陳述（formulate policies）是爲了贏得選舉，而非以選舉來陳述政策。」而實際的政治運作，如同 Garrett(1998:28)所指出的，往往是界於二者之間：「一方面選民的偏好決定了政策，而政策亦影響了選民的意向。」要贏得下一回合的選舉，就必須重視政策的承諾，同時，也必須盡量提出符合中間選民偏好的政策，形成最大可能（多數）的選民聯盟。長久以來，在先進工業民主國家中，最主要的社會分歧在於兩個不同群體間的衝突。一是支持財富與風險的配置應該透過不受干預的自由市場機制完成，這部分主要是右派政黨選民的主要偏好；另外一部份則是贊成政府應該致力於透過大規模（福利）國家介入改變市場運作後果，即左派政黨支持的核心基礎。一般而言，在經濟政策上，低所得者以及較低的職業階層團體，其主觀的經濟利益以及偏好都較為偏向採取低失業率—高通膨的總體經濟政策；反之，高失業率—

---

<sup>1</sup>我們認為全球化的外部壓力會迫使國家採行彈性的策略使勞動市場去管制化。但同時，國家也會建立國家福利系統以作為對勞動市場去管制化的補償策略。勞動市場去管制化的目標在於增強企業對於持續變遷的全球生產市場的對應能力。然而，去管制化會使得勞動者處於易受傷害和不安全的環境中。為了緩和開放所帶來的負面效果，而且保證公民的最低生活水準，因此國家必須建立國家福利系統。消極而言，國家必須提出有效方案來避免部分國民遭受上述社會風險的衝擊；積極而言，國家必須以擴張性的財政及租稅政策來調節景氣循環，以產業政策促進某些策略性產業的發展。這個策略是一般我們所熟悉的社會民主主義策略。

低通膨的總體經濟政策則是較符合高所得者以及社會階層中較高職業階層團體的偏好。執政黨的經濟政策一般是反映其所代表階級的利益及其偏好。如果無法在失業以及通貨膨脹兩者間尋找到最佳的組合，則左派政黨一般是較注重抑制失業率，右派政黨則是著重於控制通貨膨脹。在政治經濟學的古典研究中，Hibbs(1977)即根據對於二次戰後英國以及美國失業率時間序列，分析不同政黨組成對於總體經濟政策影響，結果顯示，在工黨以及民主黨執政期間，失業率有下降趨勢；反之，保守黨以及共和黨在位時，則是呈現失業率上升的趨勢。

另外，在社會政策上，兩大群體也有不同的偏好。福利國家是重分配的工具，這包括所得移轉計畫和社會服務的提供，例如教育與健康，左翼與歐陸的基督教民主政黨一直從事於福利國家的擴張。在所得移轉性支付的分析當中，以不同階級作為區分不同利益團體與選民組成相當重要。在經濟上，移轉性支付對收入分配具有相當的重分配影響(Boix, 1998)。在政治市場上，則反應了重分配面向的不同政治意識型態，並增強了兩大社會階級間的分歧。綜合而言，偏左的社會組合主義的特徵為高水平的政府支出、講求累進的租稅體制，以及必須承擔較大的赤字、較高的利率和通貨膨脹。反之，偏右的自由市場模式的特徵是小幅成長的公共經濟、較少的赤字、利率和通貨膨脹。Hibbs進一步提出了菲利普曲線的分析假設，認為失業和通貨膨脹是各民主政黨必須作的政策選擇。左派政府寧可接受通貨膨脹壓力，也要降低失業率，正因為他們傾向於照顧勞工和窮人。為了形成一個多數政黨，必須在左、右派的政治力量中取得一個折衷地位。為了拉攏中間選民，政黨政策必須有可能跳脫出意識型態的瓶頸，使政策能達到共識和整合的可能。

在面臨國際經濟體系日趨一體化的條件之下，戰後社會民主黨透過需求面管理策略追求成長與平等同時兼顧的策略，目前似乎已經面臨必須改懸更張的壓力。Boix(1998)指出，在全球經濟競爭的壓力下，相對於過去戰後凱因斯式的需求面管理策略，社會民主政黨目前似乎逐漸轉向主要以強調供給面為主的經濟政策。不過，這個供給面政策又與新自由主義者有所差異。具體而言，



所謂的供給面策略是指強化對於固定資本形成以及人力資本的投資，透過公部門在這部分的投資，由於單位生產力提高，私人資本的投資獲利率隨之增加，因而能吸引更多資本（包括本國資本以及外資）的投入。這個策略的基本想法在於，生產要素使用效率以及效能的發揮乃是對抗資本全球移動的最佳策略。許多新自由主義者雖然指出，社會民主主義干預式政策的成本，然而他們卻忽略了社會組合主義式的制度安排，可以產出正面性的外部效果(externalities)。這些外部性可以分為兩種形式。第一種是具有特殊性(specific)並且和新經濟成長理論有關。若干研究經濟成長的經濟學家認為，政府投資基礎建設，如從事造橋和鋪路到教育和訓練的研發，對於經濟成長是有利的。因此，政府花在人力和基礎建設的資本形成，不會造成全球市場的資本競爭，而個人財富和風險的重分配政策也不見得會造成大量私人資本逃竄。

我們似乎有許多理由可以支持「社會民主主義在全球化經濟中仍然具有競爭力」這個論點，其中一個理由來自於所謂的「內生成長理論」。近年來部分經濟學家認為順應市場的政府，許多政策可負擔和包含市場中高成長的生產要素，例如公共教育與訓練等基礎建設，不但有利於國民就業、改善其薪資水準，同時也可吸引資本增加投資，但是大部分政府支出的投入被認為是不具生產性的。所得移轉的方案和實質服務的提供很難直接界定是對經濟成長有利的，然而結合有力左派政黨的重分配經濟政策，倘若有充分涵蓋集體行動的勞動市場制度的配合<sup>2</sup>，則可望在全球經濟下有好的表現。

政黨當然有一定的意識型態與政策偏好，並且會在執政時尋求落實為政策。然而，政黨對於政策的影響以及其意識型態偏好卻必須要在適當的制度性條件配合下才能發生作用。例如前述左派政黨所偏好能達成充分就業以及所得重分配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由於可能引發通貨膨脹的問題，此一政策的奏效必

---

<sup>2</sup>這方面主要是以 union density (勞工加入工會的比例) 做為衡量的指標，以工會數目來作為衡量權力集中的指標。亦即勞工加入工會的比例越高、工會數目越少，則集體行動的傾向越強。參見 Garrett(1998)在表 1.2 比較 OECD 各國在一九七〇年與一九九〇年 union density 程度的變化。G., Garrett, *Partisan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Great Britis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6-8.

須有賴於（組合主義式）工會的薪資抑制政策，由工會自行吸收成本。

進一步而言，社會民主組合主義制度是建立在某種良性循環之中，政府政策藉由轉換對國家勞動市場的管制來緩衝市場的混亂，這些措施具體而言包含可預見的工資型態、由再訓練實質提升工資，導因於生產力和競爭力、高技術和製造勞工、勞資雙方的合作。這些經濟目標對於即使身處在多變的全球市場中的流動資本擁有者而言，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因為這些措施所帶來的高利潤抵銷了大政府的抑制因素和新古典經濟下的高勞動成本。

然而，社會民主組合主義策略的有效實現的基本前提在於工會組織在薪資政策上的自我限制，並且限制其會員任意罷工的羈縻行動能力。其原因是避免由於薪資上漲幅度超過經濟成長率與生產力之後造成的薪資上漲推引的通貨膨脹問題。這部分主要是涉及左派政黨與工會間，雇主與工會等社會夥伴組織在薪資政策上的相互協調與某種社會協定（或更廣泛的社會契約）的簽訂。工會組織對於此一協定的制度信任，是社會民主組合主義策略能否在全球化經濟競爭中奏效的主要因素。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衝擊下，福利刪減（或維持）、解除勞動市場管制與減稅似乎是八〇年代以來先進民主福利國家的主軸。不過，這一個衝擊在歐美各國的政策表現卻不盡相同。本文在這一篇文章將以一個新興民主國家－西班牙為例，試圖說明作為南歐福利主義典型的西班牙福利體制，即使在全球經濟整合與競爭日趨緊密的條件限制下，仍然可以採取社會民主式的擴張性福利政策。本文認為，政黨的政策立場與政黨的制度協調能力是重要的解釋變項。

一般而言，社會政策產出可以視為是以下幾個變項相互作用的結果，分別是：政黨的意識型態、政黨的社會支持及選民組成（與工會及雇主組織的關係）、政黨類型（兩黨、兩個半或多黨）、政治制度（內閣或總統制）及社會福利制度的安排等。在加入歐洲共同體、馬斯垂克條約訂定及全球競爭下勞動附加成本的壓力等背景，西班牙確實面臨了福利刪減與控制預算的壓力。不過，有趣的是，做為歐洲經濟後進國的西班牙在左派的社會勞工黨（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以下簡稱 PSOE）執政期間，同時採取擴張性的財經

與社會政策，更令人感到興趣的是，這個經驗是透過與勞工團體協商進行的。眾所周知，西班牙的工會組織一般而言是相當零散的，到底 PSOE 是如何進行協商？本文以文獻分析與次級資料分析法，嘗試探討前面所分析的刪減命題與擴張命題的爭論究竟提供了那些經驗上的證據？

## 貳、PSOE 社會民主組合主義的總體經濟策略

西班牙位於南歐，瀕臨地中海，人口約四千多萬人，國土面積約五十萬平方公里，屬於第三波民主化下成功轉型的新興民主國家。西班牙於內戰（1936-1939）結束後由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統治長達近四十年（1939-1975），其間經歷國際孤立<sup>3</sup>、經濟結構由農業轉向工業發展，直至六〇年代經濟才蓬勃發展。佛朗哥執政時期，採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一方面是基於意識型態；一方面是基於國內的需要，但是其獨裁模式卻無法建立一個完全自給自足的市場。當時國內傳統農產品出口少於其他進口商品，造成入超情形嚴重，同時伴隨通貨膨脹，此雙重的打擊，遂成為五〇年代末一連串的外匯危機。政府因此被迫求助於國際貨幣基金及其他組織，藉此解決公部門金融混亂的情形（Harrison, 1995: 7-9）。一九五八年佛朗哥政府建立一套勞資雙方協商系統，並且藉著調漲工資來刺激經濟生產力，同時也促使六〇年代的西班牙經濟開始蓬勃發展。首先，觀光客大量湧入使觀光業興盛；其次於一九五九年改善外商投資的條件，促進外資投入；再加上移居在歐洲其他國家僑民的

<sup>3</sup> 二次大戰時，西班牙獨裁執政者佛朗哥企圖藉由希特勒幫助西班牙自英國手中奪回直布羅陀的所有權，並將法國在北非的勢力驅逐出去，但是西國內戰剛結束，國力無法參加戰爭，故宣布「不參戰主義」(Nobeligerancia)，其立場較偏向軸心國。二次戰後，佛朗哥又轉而討好英、美，表示願意共同保護歐洲不受共產主義思想的侵略，也一再表示其為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六月的波茲坦會議中，與會各國建議聯合國要宣布與西班牙政府斷絕關係，並要求佛朗哥政府要建立一個自由選舉制度，才給予各項幫助。參見 許仟，*歐洲各國政府（上）*，（台北：漢威出版社，民 86 年 7 月），頁 298-299。

匯款，進而形成大筆資金移入的景象，帶動經濟景氣(ILO, 1985: 7)。然而，佛朗哥時期經濟基礎的不健全，加以勞動市場不夠自由化，導致後來無法因應七〇年代全球性的石油危機，因而產生經濟成長停滯、通貨膨脹與失業率高漲的情況(Salmon, 1995:31)。

自一九七五年佛朗哥時代結束，西班牙告別威權體制，逐步邁向民主化，於一九七八年頒佈西班牙第一部民主憲法。<sup>4</sup>除了對於公民自由權與參政權的保障外，此部新憲法在人民工作權利的保障、工作權的平等方面有詳細的規範。此外，亦明示政府應設法創造有利就業環境、提供就業訓練、解決失業問題並提供失業保險津貼等。同時，社會各界紛紛針對社會安全提出許多研究報告，如一九七七年提出的「社會安全白皮書」(El Blanco de la Seguridad Social)、一九八〇年的「紅皮書」(El Libro Rojo)、一九八一年的「綠皮書」(El Libro Verde)以及一九八二年的「黃皮書」(El Libro Amarillo)。<sup>5</sup>

---

<sup>4</sup> 西班牙經過長期的威權統治，由於中產階級不滿現狀、學生的自覺運動、地域主義的對立與教會不再支持等因素，造成佛朗哥政權的內部鬆動，此外國際情勢亦給西班牙威權政體壓力。於是，西班牙民主化的呼聲已在佛朗哥執政的後期升高，並在佛氏去世後開始進行。各黨派意見雖然不同，但基本上對於「和平改革」有一定程度的共識。在蘇瓦瑞茲擔任政府主席後首先通過「政治改革法」。此後再依據此法選舉制憲國會議員，經過專門委員會的設計和制憲國會十五個月的激烈爭辯，西班牙各主要政黨在一九七八年十月獲得妥協，通過一部民主憲法。憲法中規定，西班牙為一議會君主制國家。其內容包括序言、總綱、第一至十章、附加條款、過渡條款、廢止條款以及最後條款等，共有一百八十多條。其中第二十八條第一款明定人民有自由參加工會之權利，工會自由包括設立工會並有參加工會之權利，任何人不得被迫加入工會。此外第二款明示勞工有權維護自身利益而舉行罷工，並應制定必要之保障措施，以維持社區基本服務。在第三章「社會與經濟政策之指導原則」第四十條第一款明定政府在經濟穩定政策的架構下，將為推動社會與經濟進步以及地區與個人收入之平均分配創造有利條件，並應致力推動國民充分就業政策；在第二款中規定，政府應制定政策以保障職業培訓與轉業訓練，確保勞動安全與衛生，並藉由限制工作日數、規定有酬休假與發展適當之勞工休閒中心，以保障充分之休憩。其次，在第四十一條規定，政府應維持社會保險制度，以保障全體國民在需要時（特別是失業狀態下），得到足夠的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第四十二條規定，國家應重視海外勞工經濟和社會的權利，應保障其安全回國。

<sup>5</sup> 「社會安全白皮書」是集合當時社會安全專家意見，針對西班牙制度分析的一部報告書。「紅皮書」主要目的在根據憲法的設計與各國發展的經驗，另外也因應當時的經濟局勢，修訂社會安全制度的財務運作機制。而「綠皮書」則是針對原本的疾病保

除此之外，一九七八年所頒佈的皇家法令（Real-Decreto），大幅修改社會安全制度的組織。<sup>6</sup>其變革包含：1.廢除國民保險局與勞工互助會。2.創立新機構。由國民社會安全局（Instituto Nacional de Seguridad Social, INSS）負責一般危險事故的給付；<sup>7</sup>另設國民健康局（Instituto de la Salud, INSALUD）專門管理醫療給付；社會安全財政總管理處（Terorería General de la Seguridad Social）管理財務收入；國民社會服務局（Instituto Nacional de Servicios Sociales, INSERSO）負責社會安全制度中扶助性給付等項目；國民就業局（Instituto Nacional de Empleo, INEM）負責失業給付與相關就業政策與職業訓練。

上述幾項措施顯示，民主化後的西班牙極力擴大社會保險涵蓋範圍。憲法公布後，形式上宣示西班牙必須建立一完善的社會安全制度，且該制度為全民所共享，確立了全民化社會保險制度的發展取向。然而，這個社會保障的宣示，在實際上卻必須面臨執行上的考驗。七〇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機，引發全球經濟大蕭條，OECD 國家公部門的赤字在一九八二年時平均高於 5%，而西歐國家國營事業赤字佔 GDP 的比率，由一九七〇年的 1.4% 升至一九八〇年的 2.5% 以上(Boix, 1998: 83)。因此，部分國家開始思考將國營事業私有化、去管制化，一方面希望擺脫高負債國營企業對於國家財政的負擔；另一方面則企圖有足夠收入來削減財政赤字，不需要透過加稅或減免福利措施等方式，因此八〇年代以煤、鋼為主的國營企業開始成為改革的首要目標。不過，西歐各國由於執政黨的不同取向，呈現了不同的政策結果。保守右翼政府所採取的政策為低稅

---

險，研擬降低疾病保險的費用並提昇其品質。另一「黃皮書」出版之時正逢西班牙國內第二次國會大選，重要性相對地偏低，該報告旨在研究財務上的審計與會計方式。參見 Juan Velarde Fuerte, *El Tercer Viraje de la Seguridad Social en España*, (Madrid: Instituto de Estudios Económicos, 1990). pp. 298-328.

<sup>6</sup> 皇家法令中大幅減少勞工互助會的數目，並於同年成立「衛生與社會安全部」（Ministerio de Sanidad y Seguridad Social），所有社會保險相關業務由其負責。在一九八一年，「勞工部」與「衛生與社會安全部」合併成「勞工、衛生與社會安全部」，同年又分裂為「勞工與社會安全部」（Ministerio de Trabajo y Seguridad Social）及「衛生與消費部」（Ministerio de Sanidad y Consumo）延續至今。

<sup>7</sup> 包括老年、殘廢、生育、暫時勞動失能、職業災害等。

率、鼓勵私人儲蓄；相反地，左派政黨則採高稅收，尤其對高所得階級徵收較多的稅，為國家介入政策籌資，並大量投資於人力資本與教育上。

六〇年代西班牙經濟成長尚稱穩定，但由於經濟基礎薄弱，經不起七〇年代全球的石油危機，一九七四年開始急遽下降，引發通貨膨脹和失業率的提高。其原因被認為是佛朗哥時代過於封閉經濟與保護工人權利，以致造成西班牙勞動市場僵化。在一九八二年 PSOE 執政時，失業人口已經超過二百萬(Unidad de Políticas Comparadas (CSIC), 2000)。PSOE 在斐利貝·共薩雷茲(Felipe González)的領導下，為一溫和社會主義政黨，其主要目標有二：經濟發展以及擴大福利供給(Moreno, 2001: 104)。因此，PSOE 執政後，面對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支持者的期待，是採取擴張的財政政策、改善國營事業體質，以及與工會團體協商如何共體時艱與暫緩調漲工資，試圖提昇總體經濟的國際競爭力，並改善國內勞動市場結構僵化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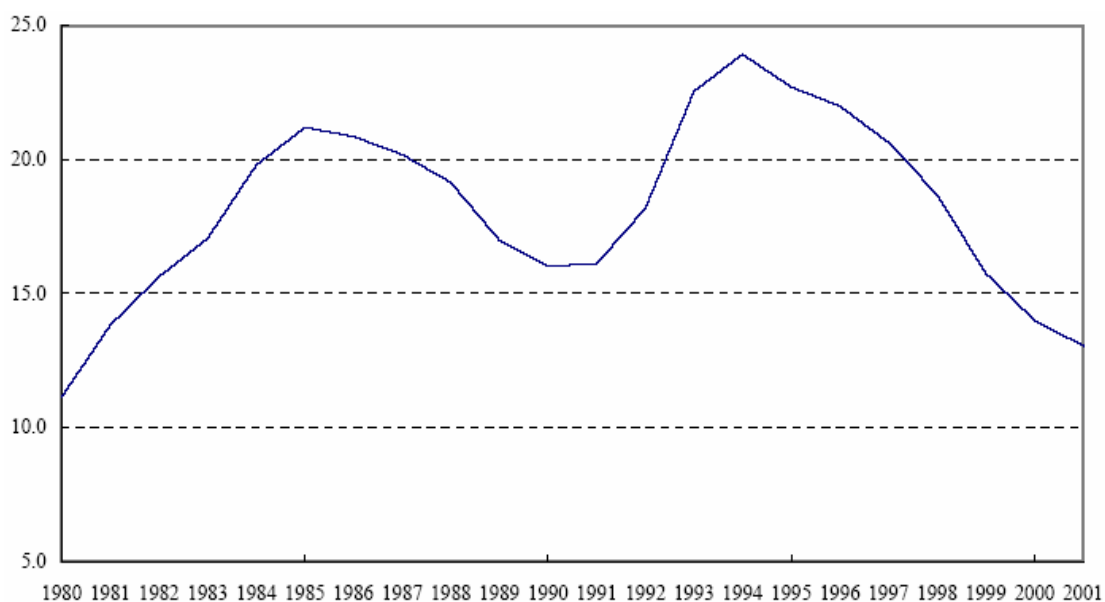


圖 1：西班牙失業率（1980-2001）

資料來源：OECD (2002) and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Spain.

當西班牙於一九八六年進入歐體時，失業率為 20.8%，約為歐體平均值 10.8% 的兩倍（如圖 1）。甚至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加入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sup>8</sup>（European Monetary Union, EMU）時，其失業率仍有 18.2% 之高，失業總人口高達三百零七萬人次，女性失業更甚於 26%。持續的高失業率促使政府必須耗費大量的福利支出以及部分公共資源直接作為失業救濟金。但是，西班牙政府又為求符合加入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的要求，而必須在預算方面採取緊縮政策，減少公共支出，促使政府財政預算的赤字降至 3% 的門檻。因此，在減少公共建設預算的情況下，影響眾多就業機會，使得失業問題更是雪上加霜，形成歐盟整合與西班牙失業問題產生互相矛盾的現象。除此之外，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承諾加入聯盟的好處包括經濟將穩定與成長，且將出現創造就業的正面效應，但問題是這些承諾的好處卻未能立竿見影（Farrell, 2001: 46）。

此外，在七 0 年代時，PSOE 即是日漸衰敗的佛朗哥政權最大的威脅，因其擁有歐洲民主人士以及國內社會民主黨人士支持的力量。由於黨內老一輩與新生代意見不合，於是漸漸分成兩派：一派是由共薩雷茲領導的改革派（Reformista），主張溫和路線；另一派則由羅多佛·游比斯（Rodolfo Llopis）領導的歷史派（Histórico），主張實行政綱所有的計畫。一九七四年在法國舉行的第二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中，共薩雷茲被選為總書記，將該黨帶入一個新的里程碑，同時其勢力逐漸龐大，並漸漸受國際的認同與肯定（張台麟，1994: 67；Gillespie, 1996: 156-157）。共薩雷茲認為馬克思主義已不符合時代的潮流，最重要的應該是爭取選民的支持，共同維護西班牙的民主政治，而不是階級鬥爭。因此在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二十八屆黨代表大會上，共薩雷茲要求將馬克思主義從黨綱中刪除，並且定義政黨為「階級的、群眾的、民主的及聯合的政黨」（PSOE, 2001）。其改革後的形象，提供了想改變西班牙政治方向，又不希望經

---

<sup>8</sup> 「經濟暨貨幣聯盟」（EMU）包括共同貨幣政策及會員國經濟政策間更密切的協調，係屬經濟整合更高層次的表現。EMU 必須建立在貨品及勞務之共同市場上，但卻又是市場順利運作之必要條件。其主要目的即藉由貨幣同盟減少歐盟會員國間貿易匯兌的風險與損失。

由革命冒險的民眾一個新選擇，使 PSOE 與共薩雷茲聲望水漲船高，因此在一九八二年的大選中，由 PSOE 獲勝躍為執政黨(許仟, 1997: 327; Gillespie, 1996: 157)。

由附錄二來看西班牙歷屆國會大選各政黨的席次，可以看出PSOE在執政期間國會席次的消長，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六年PSOE獲得多數執政的地位，自一九八九年起，國會席次下滑至175席，剛好過半數；一九九三年，獲得的席次更降為159席，首度成為不過半數的少數政黨執政，與左派聯盟(IU)結合也僅些微過半數，共177席；一九九六年大選失敗，由右派民眾黨(Partido Popular, PP)當選執政。

當 PSOE 在一九八二年首度執政時，西班牙已經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經濟危機。七〇年代初期失業率由3%以下，到了一九八二年底高達17.1%；私人投資比率由一九七四年的25.7%減少至一九八二年的18.3%。面對經濟衰退與失業率高漲的現象，PSOE 政府意識到國內市場結構僵化，不是提升國內需市場就能解決當時的經濟問題，因而改採供給面經濟策略(supply-side strategy)。此時，價格和工資的穩健節制成為經濟復甦的先決條件，政府廣泛抑制原料和食物的價格，使通貨膨脹在一九八四年降至9%。隨著議會選舉的接近，為了維持總體經濟成長，完成反通貨膨脹的目標，政府積極推動與工會間的社會契約(social pact)。其中，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總工會(UGT)，<sup>9</sup>對國家脆弱的經濟體質認知到，唯有總體經濟的穩定成長，勞工才能從中獲得工作與生活的保障，因此願意捍衛 PSOE 政府的政策，使其經濟政策更符合「社會民主組合主義模式」(social democratic corporatist model)。因此，一九八四年秋天，政府、雇主聯盟(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Organizaciones Empresariales, CEOE)和總工會(UGT)簽訂了為期兩年的「經濟與社會契約」(Acuerdo Económico y Social, AES)，其主要契約內容為暫緩工資調漲，以期在一九八六年能將通貨膨脹降至6%。相對地，政府則承諾提供公共投資的資源、公共就業、失業津

---

<sup>9</sup> 西班牙有兩大工會，不過不是每一個工會都支持這樣的協商方式，例如共產主義色彩較濃的工會聯盟 Comisiones Obreras (CC.OO)，就反對此種組合主義式的協商方式。



貼、低所得家庭減稅，以及少部分免除雇主的社會安全稅。同時，PSOE 政府逐步鬆綁貨幣政策，改採擴張性財政政策來促進私人需求。截至一九八五年中期，此一策略似乎略具成效：私人消費提升 2%，通貨膨脹率在一九八七年降至 5% 以下。此時，西班牙經濟正快速成長，政府努力維持總體經濟穩定，並透過經濟開放的增加，以試圖在一九八六年能順利整合進入歐洲共同市場 (Boix, 1998: 108-110)。

### 一、供給面取向的總體經濟策略

PSOE 在執政之初即以經濟穩定成長、低通貨膨脹，以及加入歐洲整合、提升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做為民主化後西班牙總體經濟政策的兩大目標。政府為求經濟成長、降低失業，因此積極推動供給面取向的發展策略，並增加生產要素的質與量。隨著歐洲整合的進程，市場的開放、資本自由流動增加，西班牙經濟國際化程度更加深化，必須改善國家的生產要素，才有足夠的競爭力，因此生產要素與生產力的提升便成為決定國內公司是否有競爭力的基本變項。西班牙僵化的經濟結構在遭遇兩次石油危機之後更加惡化，失業率幾乎是歐體國家平均的兩倍，國內各區域間的所得差異也很大，最富有地區每人所得為最貧窮地區每人所得的兩倍以上。總的來說，增加投資是必要的，唯有透過投資，使經濟生產力與競爭力提升，才有創造就業的基礎，問題是投資要由公部門或私部門來推動？新自由主義觀點認為應該透過減稅來促進私人投資；但就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來看，公部門應積極介入，並且重新整頓長期以來的僵化結構。大量公共支出一方面提高國家固定資本的積累；<sup>10</sup>另一方面改善的勞動力品質增加了私部門的產量以及刺激國內與國外投資，以便尋求較高的報酬率 (Zabalza, 1991b)。

雖然在七 0 年代晚期，西班牙政府也曾透過稅制改革及增加稅收來增加財源，不過由於當時政府並沒有大量支出。直到 PSOE 執政時，為達到穩定經濟成長

<sup>10</sup> 固定資本主要包括基礎建設與運輸等。

與國家對資本直接介入的政策，原有的稅收已無力支應並產生大量預算赤字，因此，加稅是共薩雷茲政府執行社會民主組合主義經濟政策的必要條件之一。由表 1 我們可以看出，PSOE 政府自一九八二到一九九一年間，總共增加 7.7% 的稅收，其中主要加重在直接稅的部分，採累進稅制，幾乎有 2/3 (5.3%) 都從高所得的個人或企業而來，所得重分配效果相當高。另外有一部份則是來自消費稅(consumption taxes)的徵收。<sup>11</sup>此外，社會支出持續增加，並逐步刪減津貼與資本移轉的部分，而大部分的稅收最初都用來降低公共赤字與增加公共儲蓄(public saving)。當赤字減緩時，政府即大量投資在基礎建設、交通運輸網絡與人力資本形成上，以促進生產力的提升。一九八九年的公共赤字佔 GDP 2.8%，比一九八六年少了 3.2%，不過由於社會支出的大量增加，一九九一年的公共赤字又攀升至約 5%(Boix, 1998: 111-113)。

---

<sup>11</sup> 西班牙準備加入歐體，因應歐體要求要徵收增值稅(value-added tax)，由於增值稅是針對營業人的銷售行為課稅，而非以營利行為作為課稅的基礎，因此所有在國內銷售貨物或勞務的行為，都是計算增值稅課稅的基礎。

表 1：西班牙政府支出與公共資本的組成（1982-91）

單位：%

	支出占 GDP 比率				1982-91 年的改變 (佔 GDP 比率)
	1982	1986	1989	1991	
總稅收	32.4	36.1	39.8	40.1	+7.7*
預算平衡	-5.6	-6.0	-2.8	-4.9	+0.7
總資本組成	6.3	8.0	9.4	10.4	+4.1
固定資本	3.1	3.6	4.4	5.2	+2.1
教育	3.0	3.8	4.1	4.2	+1.2
積極勞工政策	0.2	0.6	0.9	1.0	+0.8
社會支出	18.4	18.6	18.7	20.4	+2.0
年金	9.2	10.4	10.2	10.8	+1.6
失業津貼	2.6	2.6	2.4	2.9	+0.3
其他社會津貼	2.3	1.0	1.3	1.6	-0.7
健康	4.3	4.6	4.8	5.1	+0.8
公債率	1.0	4.0	3.5	4.0	+3.0
津貼與資本移轉	5.5	3.6	3.6	3.6	-1.9

資料來源：\* 其中直接稅佔 5.3%；間接稅佔 2%；社會安全稅佔 -0.2%；其他稅收佔 0.6%。

Statistical Appendix in Lagares 1992, 162-66, except data for active labor policies, derived from Table 5.3.

## 二、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七〇年代初期，仍然盛行四〇、五〇年代所採用組合主義哲學的法律與規範，也就是說在企業與國家層次的協商自由是有限的。同時，政府給予勞工高度的就業保障。其後雖然在民主化過程中，促進協商自由化並賦予工會更多權力，不過勞工法依然沒有改革。西班牙對勞工的高度保障，使雇主很難解雇一位固定契約的勞工，導致雇主在越來越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之下，更不願意去聘用勞工。因此，過時的生產與勞動市場制度結構，加上薪資調整僵化，使西班牙在面臨石油危機時，受到更嚴重的衝擊。此外，低度教育程度也是另一個重要因素，一九七七年，有80%的勞工沒有受過中等教育，因此，過時的生產市

場與勞動法在這樣的脈絡下更加惡化。

一九七五至八五年間，由於經歷一段時間的就業調整導致失業率的上升，尤其是一九八二年以後，失業率的攀升非常快速（見圖 1）。八〇年代中期至晚期，西班牙經濟創造許多工作，不過由於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快速增加，導致勞工供過於求，使得失業率最低僅降至一九九一年的 16%。九〇年代經濟衰退，勞動人口持續增加，造成失業率急遽上升，一九九四年時已達 24.1%。一九八二年 PSOE 執政後，雇主即對政府施壓，要求勞動市場的全面改革，以積極彈性化(flexibility)為訴求，同時，偏社會主義政黨的總工會(UGT)也同意支持政府的改革方案(Toharia, 2000: 309)。

PSOE 政府執政初期，除了在財政政策與勞動市場等方面持續改革之外，為解決嚴重的失業問題，一方面在產業革新計畫中開始主張裁員以提高工作效率。一九八三年即宣布在三年內至少裁員六萬五千人，此後於一九八四年又宣布要裁撤國營事業中的一萬五百個工作機會，遂引起工會的不滿。另一方面，工會對於一九七七年以來所訂定的節制工資妥協，以期望能換取充分就業、社會安全救濟和經濟福利措施。然而，勞工卻仍然面臨不斷萎縮的勞動市場，以及持續下降的薪資所得，以致引發接連的罷工事件。尤其是一九八八年政府提出「青年就業計畫」(Plan de Empleo Juvenil)，其針對 25 歲以下，無工作經驗的年輕人，給予工作契約的放寬與優待，引發工會勞工極度不滿，而青年就業計畫也因而無疾而終。<sup>12</sup>PSOE 政府為表善意回應，於一九八九年國會通過的決議，重新評估社會安全救濟和保險制度，對公務人員應有權利採取補救措施，並擴大失業救濟。一九九三年，PSOE 政府第四度執政，在總理共薩雷茲發表施政演說中，計畫將提撥五千億西幣以及二億西幣在失業者與在職者職業訓練。雇主與勞工間由於長期不斷罷工的結果，嚴重影響勞資關係、生產效能，

---

<sup>12</sup> 一九八八年政府受到學生運動的壓力，提出「青年就業計畫」(Plan de Empleo Juvenil)，預計三年內提撥十五億西幣來鼓勵企業為剛出社會的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工會擔心勞動市場的不斷擴大，會造成勞工工資所得僅達最低工資標準，進而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發動八百萬人大罷工。西班牙勞工抗爭罷工情況普遍高於歐洲各國，自八〇年至九〇年平均每千人每年損失 631 日，至一九九二年高達 650 日。

以及企業的競爭力(ibid, 2000: 309-310)。自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年，西班牙政府部門推動一連串就業計畫以解決失業問題，其具體措施如下（王之化，2000：56-58）：

- （一）實施促進青年就業的行政命令(Promoción del Empleo Juvenil)（1979-1981）：倘若業者願意幫助青少年獲得首份工作，則可減免繳納25%的社會保險金額；若協助失業者就業，則可減免50%的失業保險金額。
- （二）促進業者雇用領取失業救濟金者(Fomento de la Contratación de Parados Subsidiados)：其契約的效期為四個月到二年，業主可減免繳付50%的社會保險金。
- （三）促進部分工時契約(Contacto a Tiempo Parcial)：適用範圍為領有失業津貼或津貼已期滿者、失業農民、年滿25歲之失業者。
- （四）職業訓練契約：適用範圍為16至18歲失業青年，契約期限最高為二年，薪資依工作時間比例核發，但最低工資不能低於60%的基本薪資。業者若實施此案，可減免45%社會保險的支出。
- （五）暫時性契約：適用對象包括所有失業者，契約期限為三個月至三年，業者不能因此約而享有免繳付社會保險的優待。
- （六）促進婦女就業：提供免費之職業訓練、資助有家庭負擔的婦女勞工每人十萬西幣、提供最高貸款五十萬西幣，<sup>13</sup>促進婦女就業。這是唯一針對婦女就業提出的實際方案。

---

<sup>13</sup> 五十萬西幣貸款，利息六分，分八年攤還。

### 參、不穩定的結盟：PSOE 政府與工會的關係

承上節所述，政府與工會之間如何穩定協商，成為經濟政策能否奏效的主要關鍵。西班牙在七〇年代石油危機所引發的停滯性通貨膨脹衝擊下，還要承受六〇年代晚期的工資上漲壓力，因此在一九七七年隨著政黨競爭的合法化與自由選舉，政府即開始草擬民主體制的國家章程，以改善當時經濟狀況。此外，進行勞資工資協商，設法透過工資節制，降低通貨膨脹率。為了走向組合主義式的民主，控制通貨膨脹的惡化，一九七七年底，幾個主要政黨簽署工資節制契約，加強政府、雇主與工會之間的民主連結，最著名的「蒙克洛娃協定」(Moncloa Pacts)開啓西班牙新的工業關係。雖然此次契約沒有正式的雇主聯盟與工會的參與（當時尚未合法化），不過契約內容涵蓋薪資設訂的標準，以及強調薪資的調漲是依照預期通貨膨脹所決定。社會契約的訂定提供西班牙發展組合主義式的制度環境，形成社會夥伴關係，使雇主和工會之間的協商不需要透過政府，彼此對於工資範圍必須順從，奠定勞資政三方協商的基礎。此契約的簽訂在當時一方面為了平息軍事政變的恐懼，一方面成為民主化進程，確保社會民主、和平的重要協定(Moreno, 2001: 103; Toharia, 2000: 315-316; Jimeno, J. and Toharia, L.,1994: 74-76)。

表 2：蒙克洛娃協定與社會經濟契約的比較

	簽署團體	薪資增加的範圍(%)	計畫期限	當時薪資增加率(%)	通貨膨脹率(%)
1978 Moncloa Pacts	政黨	20-22	無	20.6	19.8
1985 AES-1 <sup>st</sup> Year	政府、UGT、CEOE	5.5-7.5	2年	7.9	8.8
1986 AES-2 <sup>nd</sup> Year	政府、UGT、CEOE	7.2-8.6	2年	8.2	8.8

資料來源：1. Boletín de Estadísticas Laborales, various issues; 2. cost-of-living index.

自蒙克洛娃協定之後，在八〇年代早期，政府仍繼續試圖完成組合主義式的協商。基於工作法(Ley del Estatuto de los Trabajadores, LET)規定，集體協商是勞工的權利，因此典型的政府、雇主聯盟與工會之間的協商包含兩個部分(Jimeno, J. and Toharia, L.,1994: 76)：1. 政府在經濟政策上設定的三角協商制度包括所得政策、社會安全、失業保障、一般就業條件以及公共行政體系勞工的訓練和工資的調漲等部份。2. 此外，雇主聯盟與工會協商最主要是節制薪資上漲，不過，同時還包括其他就業條件的協商，例如生產力的增加、勞工罷工等，皆取決於集體協商的結構以及衝突的解決。

政府面對國內通貨膨脹與歐洲整合的壓力，一方面與工會協定節制工資上漲，以共同降低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如果節制工資效果不彰，將透過貨幣緊縮來平息通貨膨脹。政府除了要求經濟部遵守一九七七年底訂定的工資協商制度，並保障低所得者和高所得者的稅收比率不同(Boix, 1998: 132)。因此，工資支出自一九八四年以後大幅降低，低於獲利盈餘，確實使得通貨膨脹率由初期 12.5%，降至一九九〇年的 7.3%，暫時減緩高通貨膨脹的現象(Pérez, 1999: 666)。

PSOE 政府的首要目標為總體經濟的穩定，以及國家介入政策的執行，不過，由於共薩雷茲很難同時符合中產階級（減稅需求）與勞工階級（加薪需求）間不同的需求，加上政府與工會關係在一九八八年後逐漸分歧，使得政府原先的社會民主組合主義政策目標有所限制。社會民主組合主義政體典型是以北歐國家為代表，主要透過政府與工會間強而有力的協調能力，原則上可以減輕政府在高比率公共投資的成本；另一方面，透過工資的節制，提升總體經濟的穩定，但是這個策略在西班牙 PSOE 推行的結果並不如預期。在一九八五年之前，工資節制政策順利推行，然而，一九八六年之後，伴隨著西班牙經濟的快速成長，勞工開始要求工資調漲，一九八九年至九二年，名目工資上升超過通貨膨脹以及生產的獲利。同時間發生經濟過熱與工會要求調漲薪資，使政府改採緊縮的政策來減輕需求和通貨膨脹(Boix, 1998: 130-131)。

Scharpf(1989)在他關於歐洲社會民主政黨經濟政策的經典研究中指出：

「在充分就業、低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擴張性經濟政策與工資節制才能獲致最大的效果。」一方面，在充分就業下，工資節制還可以滿足勞工階級；另一方面，不損害國家經濟表現，同時，還能保有中產階級的支持。總的來說，它保障社會民主政黨的再執政，同時也有足夠的工作給勞工。我們可以透過圖 2 工會與政府間的互動，看到一個簡單的賽局架構，針對政黨與工會對擴張政策至緊縮政策，以及薪資節制至薪資增加偏好做矩陣，每格左下角的數字代表政府的偏好，右上角的數字代表工會的偏好，數字代表偏好的強度，4 為最強。因此，要使圖 2 中的黑點移動至白點，意即一般工會組織對工資節制政策妥協，主要要有兩個先決條件：1.工會必須集結足夠的力量，隨時能向雇主要求提高工資；2.工會組織制度必須健全。然而，西班牙工會都不具備以上兩項條件。由於工會成員僅佔全體勞工的 16%左右（見附錄 3），且大多是固定契約的技術性勞工，加上工資設定制度阻礙工會在工資節制協定的能力。此外，工資協定通常在各企業部門間產生，無法真正達成雇主與勞工團體工資協商的目的(Boix, 1998: 134-137)。工會與政府對立，使政府原本以工資節制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的成效有限，並影響政府平衡預算赤字的承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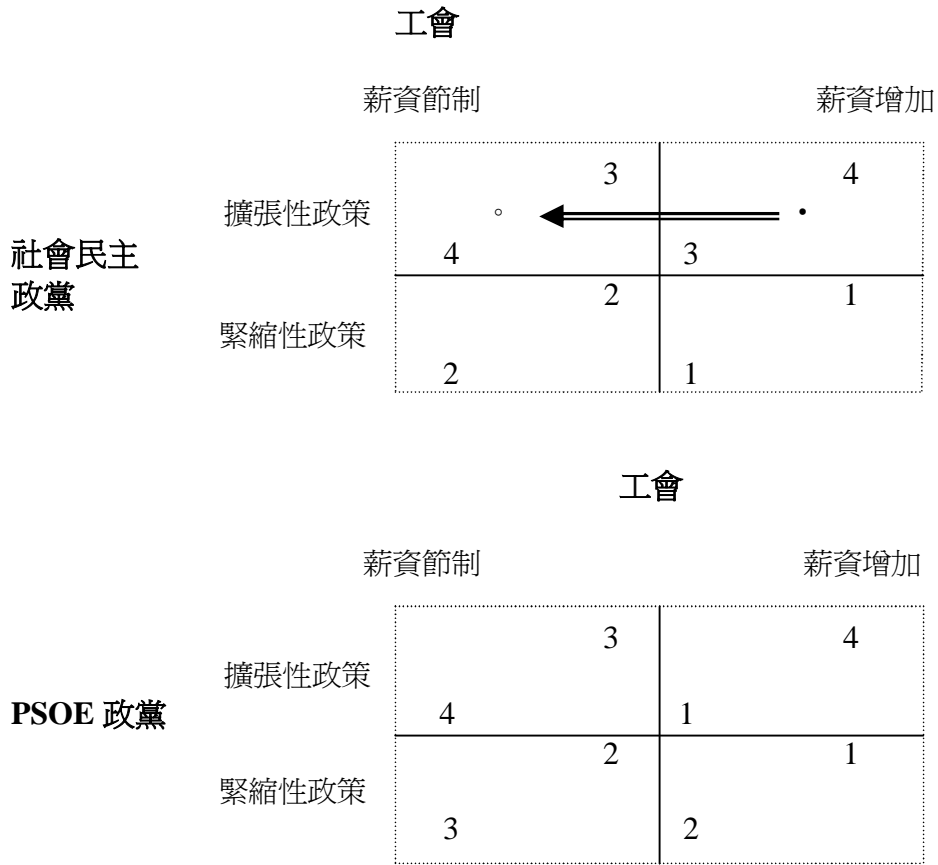


圖 2：社會民主政黨以及 PSOE 政黨分別與工會互動的情形

資料來源：Boix, 1998: 135-136.

說明：右上角數字為工會偏好順序，4 表示最偏好的結果；1 表示最不偏好的結果。

## 肆、加入歐體對社會民主組合主義的限制：歐體與歐元區的影響

PSOE 在推行社會民主組合主義策略的同時還面臨另一個難題，也就是超國家組織以及區域經濟整合的問題。西班牙自一九八六年加入歐體後，每年接受歐體大量的經援與外資，加上政府大規模投資基礎建設，如連結歐洲的高速公路與通訊現代化，以及一九九二年的巴塞隆納奧運會的周邊建設，將西班牙的經濟成長推向顛峰，創造二百五十萬個就業機會。在一九九一年時，還一度躋身為全球第七大經濟體（鍾太原，1996: 22）。西班牙在加入歐體初期確實從中獲得了相當的經濟利益。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間，西班牙總資本組成的年平均增長率為 14.1%，是同時期歐洲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其他國家的兩倍。一九八五年總資本組成大約是國民生產毛額的 19%，於一九八九年已經成長至國民生產毛額的 26%。西班牙的產量在四年內增加 20%，接近歐體的平均數，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九年的 GDP 成長 4.8 個百分點（見表 3）。西班牙這四年的經濟成長，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不僅勞工需求增加，工資也在此時應勞工要求大幅上漲，<sup>14</sup>勞動市場同時採行彈性政策，每年平均就業成長率為 3%，失業率由 20.7% 降至 16.9%。除此之外，公共部門赤字與通貨膨脹等問題，皆在此時期獲得改善。<sup>15</sup>

---

<sup>14</sup> 在 1986 年至 90 年中，平均勞工工資增加 7.4%；1991 至 92 年兩年間的工資上漲高達 8.5%，是歐體中工資上揚幅度最高的國家。

<sup>15</sup> *The Labour Market in Spain: The Growth Phase 1986-1989*, (<http://www.docuweb.ca/SiSpain/english/economy/growth.html>), 1993.

表 3：需求與產量平均年增比率

單位：%

	1986-1989	1990-1992
私人消費(Private consumption)	4.9	2.3
政府消費(Government consumption)	6.6	2.9
總資本組成(Gross capital formation)	14.1	1.9
出口(Exports)	3.9	5.2
進口(Imports)	17.0	7.8
就業率(Employment)	3.1	0.3
國民生產毛額 (GDP)	4.8	2.4

資料來源：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INE).

然而，自一九八八年起，生產過熱的現象開始出現，通貨膨脹不斷直線上升，原本平衡的支付體系也開始惡化。雖然國內產量仍穩定成長，國內需求每年依舊保持上升三個百分點，但是過度的需求量超過西班牙國內的產量，造成國內價格上揚，國外購買力繼續增加，以致引發過度需求所造成的通貨膨脹。有鑑於此，西班牙政府開始採取緊縮的經濟政策，企圖減低需求量，以期供給與需求能平衡，這項計畫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馬斯垂克條約中受到認可，<sup>16</sup>不過，緊縮的經濟政策對西班牙經濟卻造成極大的衝擊。由於之前大量需求的結果，使得產品從高成本走向高價格時，並沒有因而減低銷售量；而且工資上漲所引發的通貨膨脹也沒有造成失業惡化，但自從實行緊縮的經濟以後，使得西班牙經濟無法負荷突然的轉變，加上工資在一九九一至九二年間持續上漲，因而造成許多公司開始必須藉由裁員減少勞動成本支出以爲因應(Compston, 1997: 106-107)。然而，減薪與裁員卻又導致了國內需求的大幅緊縮，更不利於經濟的成長。

最後，隨著馬斯垂克條約以及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計畫的執行，歐盟國家間關係更密切，政府財政赤字是各會員國首要面臨的問題。對西班牙而言，極力減少公共赤字與政府負債，公共部門民主化後的重組轉型，是西國政府幾年

<sup>16</sup> The Labour Market in Spain: *The end of economic expansion 1990-1992*, (<http://www.docuweb.ca/SiSpain/english/economy/labour.html>), 1994.

來努力的方向。馬斯垂克條約規定任何想加入貨幣聯盟的會員國，必須遵守預算規範：1.國家財政赤字必須低於3%以下；2.政府負債不得超過GDP的60%。一九九六年都柏林舉辦的歐洲高峰會中制定「穩定與成長公約」(The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會中附帶條款保證會觀察各會員國是否有持續執行控制預算計畫，以便加入貨幣聯盟。若未在規定時間內達成標準，將處以罰金約GDP的0.2%至0.5%，因此西班牙對於財政赤字問題如何改善主要先從增加政府稅收著手(Farrell, 2001: 102)。爲了要符合馬斯垂克條約的規範，已無法採取過去擴張式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而必須改採緊縮性政策。這也限縮了採取社會民主組合主義策略的行動空間。

PSOE 執政長達十四年，國內失業問題並沒有獲得太大的改善，雖然該黨極力控制國內的通貨膨脹與失業率，其採行的供給面經濟政策，需要不斷穩定成長的經濟，以及長時期的體制結構轉型與勞方願意長期共體時艱才可看出功效。不過，一九九六年國會大選中終究在貪污醜聞與選民失去信心下，嚐到敗選的苦果，由民眾黨(Partido Popular, PP)勝選執政。

## 伍、民眾黨執政期間

一九九六年的國會大選中獲勝而首度執政的民眾黨黨魁艾茲納(José Maria Aznar)，在五月三日眾議院發表政策演說，會中提出施政計畫方針，其重點在於(王之化, 2000: 83-85): 1.爲準備加入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EMU)，將嚴格執行歐洲聯盟條約的要求，將國家赤字控制在3%以下，因此政府的預算支出立刻受到考驗。<sup>17</sup>2.財政改革、增加自治區稅收，中央裁減預算兩千億西幣。<sup>18</sup>3.維持既有的國防與外交政策。4.聯合各地方民族主義黨派。5.與勞資

<sup>17</sup> 1995年的預算赤字為5.8%，必須在1997年降至3%。

<sup>18</sup> 自治區個人所得稅分攤部分由15%調高為30%，自治區政府的稅收自行運用比例，將增加為40%。此外，爲求達到實施單一貨幣的目標，穩定經濟發展，並增加就業機會，中央政府各部會將裁減相當於佔國民生產毛額0.4%的財政支出，總計達西幣兩千億元。

雙方舉行諮商談判。西班牙最高資方代表「雇主聯合會」、勞工代表「聯合總工會」、「勞工委員會」以及政府三方面，針對如何增加就業勞工雇用契約、提供職業訓練、改革退休制度等議題進行討論。<sup>19</sup>6.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sup>19</sup>7.維持社會福利制度。以下就民眾黨執政後的新經濟政策、勞動市場改革、推動勞資協商與促進就業等分別討論之。

### 一、民眾黨的新經濟政策

民眾黨執政後，第一個面臨到加入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的壓力，政府希望與其他會員國同時加入經濟暨貨幣聯盟，另外，還必須在政府預算及通貨膨脹方面進行嚴格管制，以符合馬斯垂克條約所規定之要求。西班牙第二副總理兼經濟財政部長拉多（Rodrigo Rato）坦承面對政府預算與加入經濟暨貨幣聯盟的壓力，陷入兩難的局面，然而，在新政府執政後立即宣布削減兩千億西幣的預算支出，其主要在於公共工程方面。<sup>20</sup>

除了削減預算之外，施以振興與開放等配套措施，以求降低通貨膨脹的壓力。例如，放寬營建業限制以降低房價，利用私人儲蓄與提供企業租稅優惠來刺激經濟成長。在租稅改革方面，將資本收益稅率降至 20%，較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 56% 更低。這一連串措施主要是向企業界表明政府極力採取行動刺激成長力，希望他們能對政府重拾信心。在面臨歐盟即將於一九九九年實施單一貨幣的挑戰，政府於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一日通過自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〇年之「四年經濟穩定計畫」，以控制物價、減少政府財政赤字，以及創造就業機會為目標，規劃西班牙未來四年的經濟發展藍圖。此外，經濟結構過於僵化

---

<sup>19</sup> 西班牙國營事業龐大，其中虧損嚴重的如伊貝利亞（Iberia）航空等，在經濟與員工就業問題的考量下，仍繼續由政府出面支撐。不過，在四年內將計畫逐步邁向民營化，以改善總體經濟。

<sup>20</sup> 除了削減公共投資，還降低經常性支出，以及凍結公務人員薪資，預期社會保險收入及稅收將高於經濟成長率。除此之外，民間則加強投資與抑制薪資漲幅，以便降低通貨膨脹率及調低利率。參見中歐促進會，「西班牙商情摘要」，《歐洲經貿參考資料》，第 15 卷第 5 期，民 85 年 7 月，頁 13。

是西國勞動市場亟欲增進就業的一大障礙，因此結構上的改革是當務之急，以便在經濟衰退的時期，增加工資價格的敏銳度與彈性。在公共部門方面，加強教育、健康、電訊與運輸等服務，使其更具競爭力。另一方面，國營事業民營化的腳步也持續進行，政府主張讓市場自由運作，盡量減低政府干預市場，私有化的腳步較 PSOE 執政時期更快速(Gual, 1996: 115-116)。

## 二、勞動市場改革

由於勞工法規對於產業生產成本造成很大的負擔，過渡保護勞工權益，使雇主不願意任意解雇勞工，以避免損失龐大的資遣費用，因此造成市場勞工流動率低，連帶影響工作效能同時也助長失業的產生，於是政府在 1996 年提出一連串勞動市場改革，期望達到薪資水準合理化、改善勞工法規、促進就業機會等共識。關於勞動市場的改革有幾項目標(European Commission, 2000: 6)：1.減少非工資勞工花費，創造穩定就業，包括增加部分工時工作、補償社會弱勢團體以及減少失業；2.擬定提升生產力的策略方針；<sup>21</sup>3.在穩定就業法規通過後，例如工作與家庭生活協調方面之法規 (Law for the Reconciling of Family and Working life)、臨時雇工權利的釐清、以及他國國民在西班牙的權利與參與社會整合等事項 (Law on the Rights of Foreigners in Spain and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增加就業政策預算以期達成目標。

西班牙「雇主聯合會」及兩大工會「聯合總工會」、「勞工委員會」，在歷經一年的談判後，在一九九七年四月達成勞動市場改革協議，其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合編，1997：375)：

- (一) 新式固定合約：對於失業者，如 18 歲至 30 歲以登記謀職時間達一年以上者、45 歲以上、殘障人士及臨時短期合約轉為固定長期合約者，如無正當理由予以資遣，資方需支付勞工每工作一年就有 33 日的遣散費，最多不得超過 24 個月薪資。

---

<sup>21</sup> 例如 INFOXXI 計畫，包括社會資訊發展計畫、國家研究計畫以及改革計畫等，有助於發展企業精神。

(二) 臨時合約：針對滿 16 歲至 21 歲無學歷之年輕人，提供在職訓練工作合約。

(三) 修改遣散法規：修訂勞工法，避免大部分具有客觀理由之遣散案件，被法官以未具正當理由判決資方敗訴。

(四) 工時及加班時數：由勞資雙方集體談判時，決定是否要減少工作時數，並要求政府運用勞工法賦予他們權利，來減少或取消加班時數。

由下表 4 所示，在二 0 0 一年三月公布勞資雙方最新協商提案，其內容較一九九七年作些微修改，在固定契約方面擴大適用範圍，年齡層也上下放寬，並將部分固定合約改為臨時合約，增加就業機會。

表 4：2001 年勞動市場的改革方案（勞資協商提案）

	雇主團體聯合會 (CEOE)	工會團體
固定合約 (contratación indefinid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在新合約中普及化失業者一年可領取 33 天的補償金。</li> <li>• 適用範圍的修改方案：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16 至 33 歲</li> <li>2. 超過 45 歲</li> <li>3. 失業超過半年</li> <li>4. 婦女</li> <li>5. 殘障者</li> <li>6. 為促進就業將固定合約改為臨時合約</li> <li>7. 減少被解雇者的手續費</li> </ol> </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若將固定合約改為臨時合約，則一年可領 33 天的失業補償金，將有四年的法定有效期限。</li> <li>• 現行制度的修改。</li> </ul>
臨時合約 (contratación tempora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放寬各種形式的臨時合約之限制。</li> <li>• 為完成一件工作而與同一個勞工先行簽訂下次的臨時合約，將被視為詐欺。</li> <li>• 臨時合約最高期限為十二個月。</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增加有合約勞工的薪資，逐漸減少未明確的合約。</li> <li>• 有兩個或以上固定合約的勞工，其合約是明確清楚；然而，臨時合約是屬特殊情況，其判定必須更客觀。</li> <li>• 嚴格篩選部分不合格</li> </ul>

		的臨時合約。 • 確定簽約動機，僅限於臨時性的就業。 • 尊重非歧視原則。 • 臨時性合約應擺脫其滯留性。 • 討論主合約與附屬合約的管理方式。
部分工時合約 (contratación a tiempo parcial)	• 工作時數依據合約或法定最高時數所定。 • 一年的工作時間彈性分配，在合約上也明文規定在日期確定前 15 天必須預先通知。 • 工時提案的修改或增補必須到達 20% 勞工之要求，才可能成行。	• 於討論工時分配的前提下，協商應依據勞工保險，再界定確切工時。

資料來源：ELPAIS.ES, Las propuestas de patronal y sindicatos, *La Reforma Del Mercado Laboral*, (URL: <http://www.elpais.es/multimedia/espana/tabla.html>), 2001.

## 陸、結論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福利國家，乃是西北歐與美國等工業先進國家，有鑒於兩次大戰之間所爆發的經濟危機及其伴隨而來的社會動盪，透過國家諸多積極介入手段以尋求集體對抗社會風險的制度安排。如所週知，這個尋求集體社會安全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奠基在由凱因斯所提供的總體經濟管理理論：透過充分就業與國家總體經濟的調控等政策，現代國家得以提供福利國家賴以維繫的財稅基礎與可供以重分配的財源。凱因斯主義在戰後成為跨越左右兩派意識型態的經濟主張，為國家積極介入勞動市場與提供積極的移轉性支付 (transfer payment) 提供了一個堅強的理論辯護基礎。同時，也透過「管理式資本主義」的方式為經濟成長與平均分配提供了一個結合的可能性，而且不一定要透過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的手段 (Pierson, 1991: 26-28)。



充分就業的目標得以完成，主要有賴於國家能有效控制資本的流動，這又透過各國央行有效的利率政策。透過中央銀行的利率政策可以有效地調節資本的流動，並且侷限在民族國家的範圍內。這種「一國凱因斯主義」成功的條件主要有賴於戰後以美國為首，為了安定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所建立起來的布林頓森林協議（Bretton Wood Agreement）。布林頓森林協議取代了一次大戰前的金本位體制，而代之以美金本位體制，其手段是藉由各國貨幣以美金做為計價單位，透過穩定貨幣兌換率的制度使各國外貿交易得以順利進行。七〇年代中期所出現的兩次石油危機，破壞了布林頓森林協議所提供的穩定交易環境。美國放棄了美金本位體制，而代之以浮動匯率制(Cerny, 1990: 222)。

全球化對於福利國家繼續維繫最大的挑戰在於：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被迫」暴露於開放的世界經濟。過去是國家能透過某些制度與政策工具「管理」市場；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則是各個民族國家浮游於競爭益趨激烈的市場大海之上，失去了國家駕馭市場機能的能力，並據以創造維繫大眾忠誠，保障公民福利權的資源。在經濟日趨國際化的情況下，國家如果考慮採取某些凱因斯式的政策手段來保護國內經濟，結果往往適得其反。

凱因斯式的福利國家的失敗在於總體經濟需求面的管理已經宣告為不可能，取而代之的是中間與微觀層次的調控(Cerny, 1990: 222)。國家已經不可能達成充分就業的目標(Offe, 1995)，取而代之的是國家能提供多少有利具競爭力的條件來吸引外資的投入。國家在提高本國競爭力時必須採取若干措施，例如鼓勵某些策略性產業，但同時解散不具備競爭力的夕陽工業。在此一轉化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過程中，其代價就是造成某些所謂「不適任」勞工的間歇性失業與隨之而來的高失業率，這就是西北歐自八〇年代末期以來所經歷的「結構性失業」困境。

與二次戰後二十年的所謂黃金年代相比，經濟全球化使先進福利國家遭遇新的挑戰，影響國內就業和社會政策系統，在商品市場，國際競爭加強，流動的公司可選擇全球最吸引人的投資環境，於是各國的政策傾向對資本有利，

國家稅收及資本管制的的能力都受到限制。因而政府和工會如想維持就業的成長，就必須要提高生產力而非一味地強調重分配。另一方面，緊縮福利卻會遭受巨大的政治上反對壓力，特別是當執政的左派社會民主黨遇上強調重分配政策的勞工與工會。但福利國家的收入，卻會因國際間稅率競爭、非勞動薪資成本減少的需要、避免公部門赤字，而有所限制。

一九八六年，西班牙加入歐體後，便成為歐洲化進程中一個重要的政治夥伴，並且在經濟政策上，遵循歐體國家逐漸聚合的路徑。一方面為面對經濟與歐體的壓力，逐步邁向開放與自由化；另一方面，來自工會對於更多福利支出的壓力，促使「新組合主義」(neo-corporatist)的實行。換言之，西班牙在民主轉型的時期，其福利發展是以協商為主軸的模式。一九八四年由 PSOE 政府、雇主聯盟與工會簽訂為期兩年的「經濟與社會契約」(AES)，即是以上述模式進行協商(Moreno, 2001: 106)。而這個組合主義式的策略也曾經在一九八五到一九八七年這段時間發揮了相當的作用。然而，隨後由於工會方面逐漸採取較為激進的薪資策略，與執政的 PSOE 迫於歐體及稍後 EMU 的要求，必須逐漸改採緊縮性的總體經濟政策。左派政黨與工會間的結盟關係遂告破裂。西班牙此一案例對於目前討論的福利削減或擴張命題的辯論，其主要貢獻在於指出政黨的策略是一個重要的解釋變項。Garrett(1998) 指出了在以強大左派廣泛結合勞工運動(社會民主的組合主義)的國家之表現，其總體經濟表現也能較左派勢力較弱的國家好。但是，社會民主組合主義的成功關鍵在於一個相互協調社會民主政黨與工會的制度安排。因為社會民主政黨能夠採取擴張性的總體經濟政策，擴大國內的總體需求，改善國內勞動力的品質與生產力。前提是工會必須在薪資政策上採取合作的自我薪資限制政策，以避免因薪資成長過快，導致「成本推擠的通貨膨脹」。

左派政府一般認為較有利於勞工能減少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因此，左派政府持續在位，有助於薪資規則的接受，政府過去表現，國家效能也都影響勞工信任，對於未來經濟展望的預期更是重要因素。然而，左派政府是否一定有利於勞工的利益，馬克思及新馬克思主義皆認為合作不為工人之利益。戰後左派

政府是以福利國家所提供的社會薪資或改變稅率的手段，以補償勞方接受薪資自我限制規則的損失。但因政府補償的是公共財，無法排他，故一般勞工與工會寧可當「搭便車者」(free-rider)，盡量不受薪資規則的限制，個別採取激進罷工的手段以極大化其提高薪資的利益。

理論上，解決這個政策協調難題的方法有兩個，一是組織上，一是制度上。前者可以透過較高的工會組織率來內化提高薪資的成本，例如北歐的社會民主模式。後者則可以透過將工會納入某種廣泛的社會契約制訂架構中，例如荷蘭與奧地利等歐陸國家。然而，西班牙在這兩方面都有所欠缺，因而解釋了民主化後西班牙左派的PSOE推動社會民主組合主義策略失敗的原因。

## 附錄一 西班牙主要經濟指標(1961-2004)

年度變動百分比(%)

	1974-85	1986-1990	1991-95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b>1. GDP 成長與其構成要素</b>													
私人消費	1.5	4.6	1.2	1.7	2.2	3.2	4.4	4.7	3.9	2.5	1.9	2.1	3.1
政府消費	4.8	6.4	3.0	2.4	1.3	2.9	3.7	4.2	5.0	3.1	3.8	3.5	3.2
總固定資本組成	-0.6	10.9	-0.5	7.7	2.1	5.0	10.0	8.7	5.7	3.2	1.4	2.1	4.1
出口	6.0	3.1	9.9	9.4	10.4	15.3	8.2	7.7	10.1	3.4	1.4	3.3	4.3
進口	2.5	17.0	6.7	11.1	8.0	13.2	13.2	12.7	10.6	3.5	2.2	4.2	5.4
GDP	1.8	4.5	1.5	2.8	2.4	4.0	4.3	4.2	4.2	2.7	2.0	2.0	3.0
<b>2. 總儲蓄與投資佔 GDP 比率</b>													
私部門儲蓄	21.3	21.8	21.6	24.2	23.3	22.1	21.2	19.6	19.2	18.9	19.2	19.5	19.3
家戶淨儲蓄	-	-	-	6.6	6.4	5.6	4.6	3.7	3.1	2.7	-	-	-
政府總儲蓄	1.2	1.3	-0.7	-1.8	-1.2	0.4	1.2	2.9	3.3	3.9	4.2	3.9	4.3
全國儲蓄	22.5	23.1	20.9	22.3	22.0	22.5	22.4	22.4	22.4	22.7	23.4	23.4	23.6
總資本組成	24.5	24.5	22.9	22.3	21.9	22.1	23.3	24.5	25.7	25.7	26.0	26.1	26.3
<b>3. 就業與失業</b>													
就業	-1.3	3.6	-0.3	1.9	1.3	2.9	3.9	3.5	3.4	2.4	1.3	1.0	1.7
活動率	58.5	59.2	61.6	62.1	62.3	63.1	64.0	64.2	64.9	65.3	66.4	66.8	67.4
就業率	54.0	50.4	51.5	50.8	51.3	52.6	54.5	56.1	57.6	58.5	58.9	59.1	59.8
就業率(全職)	-	48.5	49.5	48.8	49.2	50.6	52.5	54.1	55.5	56.4	56.7	57.0	57.6
失業率(Eurostat 定義)	8.2	15.4	17.1	18.8	18.1	17.0	15.2	12.8	11.3	10.6	11.4	11.6	11.4
<b>4. 價格與薪資</b>													
每人名目薪資	18.0	8.3	7.2	3.7	4.5	2.3	2.7	2.7	3.7	4.1	4.0	3.9	3.6
每人實際薪資	2.4	1.6	1.5	-1.1	1.0	-0.3	0.5	0.3	0.6	0.8	0.3	0.7	0.9
名目單位勞動成本	14.3	7.3	5.2	2.8	3.3	1.4	2.5	2.1	3.0	3.8	3.2	2.9	2.2
實際單位勞動成本	-0.6	0.0	-0.2	-2.0	-0.2	-0.9	0.1	-0.6	-0.5	-0.4	-1.1	-0.8	-0.7
<b>5. 政府總預算佔 GDP 比率</b>													
支出	31.0	41.0	45.4	45.0	43.7	41.8	41.4	40.2	39.8	39.3	39.6	39.8	39.6
現時稅收	28.6	36.9	39.7	38.4	38.8	38.6	38.3	39.0	39.0	39.2	39.6	39.3	39.5
負債	42.3	43.6	63.9	63.9	68.1	66.6	64.6	63.1	60.5	56.9	54.0	52.5	50.5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2003), *European Economy*, N4, Table84, pp.308-309.

附錄二 西班牙歷屆國會大選各政黨的席次（1982-2004）

	1982	1986	1989	1993	1996	2000	2004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PSOE)	202	184	175	159	141	125	164
Partido Popular(PP)	107	105	107	141	156	183	148
Convergencia i Unió(CiU)	12	18	18	17	16	15	10
Izquierda Unida(IU)	0	7	17	18	21	8	5
Unión de Centro Democrático(UCD)	11	0	0	0	0	0	0
Partido Nacionalista Vasco(PNV)	8	6	5	5	5	7	7
Coalición Canaria(CC)	0	1	1	4	4	4	3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PCE)	4	0	0	0	0	0	0
Centro Democrático y Social(CDS)	2	19	14	0	0	0	0
Herri Batasuna(HB)	2	5	4	2	2	0	0
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ERC)	1	0	0	1	1	1	8
Euskadiko Ezkerra(EE)	1	2	2	0	0	0	0
Bloque Nacionalista Galego(BNG)	0	1	0	0	2	3	2
Chunta Aragonesista(chA)	0	1	1	1	0	1	1
Unió Valenciana(UV)	0	1	2	1	1	0	0
Partido Andalucista(PA)	0	0	2	0	0	1	0
Eusko Alkartasuna(EA)	0	0	2	1	1	1	1
Iniciativa per Catalunya-Verds(IC-V)	0	0	0	0	0	1	0
Nafarroa Bai(Na-Bai)	0	0	0	0	0	0	1
Others	0	0	0	0	0	0	0
Total	350	350	350	350	350	350	350

資料來源：Election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Election to the Spanish Congress of Deputies-Results Lookup, (<http://electionresources.org/es/congress.php?election>), 2005.

## 附錄三 歐洲國家工會密度比較 (1970-2002)

單位：%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2
瑞典	67.7	74.5	79.9	84.0	84.0	87.6	79
丹麥	60.0	67.4	76.5	78.3	73.2	78.3	88
芬蘭	51.4	67.4	69.8	68.6	72.0	78.4	71
比利時	45.5	51.9	53.4	52.0	51.2	49.7	69
挪威	50.6	52.7	56.9	55.7	56.0	57.7	-
愛爾蘭	53.1	55.2	57.0	56.0	50.6	46.2	45
英國	44.8	48.3	50.6	45.5	38.1	32.1	29
義大利	36.3	47.2	49.3	42.0	40.1	37.7	35
德國	33.0	36.6	36.3	34.0	32.9	29.1	30
瑞士	29.5	33.0	32.3	29.1	25.8	25.2	-
奧地利	57.7	53.5	52.7	52.7	47.2	43.3	40
荷蘭	37.0	38.4	35.3	28.7	25.4	25.7	25
法國	22.3	22.8	19.0	16.3	11.0	10.0	9
西班牙	-	-	8.3 <sup>a</sup>	10.3	12.1	18.6	15
葡萄牙	-	52.4	54.0	43.0	33.0	26.8	30

說明：1. 工會密度意指加入工會的就業勞工佔總勞動人口的比例，除了愛爾蘭、葡萄牙與瑞士三國計算的方式為總成員，包括失業與退休者在內。2. a 為 1981 年的資料。

資料來源：1. Sabine Blaschke(2000), "Union Densi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Diverging Converg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6(2), p.219.

2. 2002 年資料為 Eurostat Labour Force Survey 2002。

## 參考書目

- 中歐促進會(1996)。(西班牙商情摘要),《歐洲經貿參考資料》,中歐促進會:  
15(5), 13。
- 王之化(2000)。《從西班牙民主化的政經發展過程看其失業問題  
(1970-1998)》,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呂建德(2003)。(全球化與福利改革的政治經濟學:以荷蘭與丹麥為例的分  
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南投:7(2), 121-170。
- 李誠(1995)。(蛻變中西班牙國營事業的勞資關係),《經濟前瞻》,台北:10  
(6), 85-87。
- 張台麟(1994)。(西班牙政黨政治之發展及其特性),《問題與研究》,台北:  
33(6), 67。
- 許仟(1997)。《歐洲各國政府(上冊)》,台北:志一出版社。
- 陳信宏(1995)。(國際經濟動向—西班牙的經濟發展與產業政策),《經濟前  
瞻》,台北:10(6), 78-81。
-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997)。(西班牙),《1997-98 海外市場經貿年報(歐洲篇)》,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合編, 375。
- 鍾太原(1996)。(由高成長步向高失業的西班牙),《貿易週刊》,台北:1686,  
22。
- Almarcha Barbado, Amparo(1993) *Spain and EC Membership Evaluated*.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 Bermeo, Nancy G(2000) *Unemployment in Southern Europe-Coping with the  
Consequences*. London: Frank Cass.
- Boix, Carles (1998) *Political parties, growth and equality: conservative and social*

*democratic economic strateg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stells, Manuel(2000)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2<sup>nd</sup> ed, 3 vols. Oxford: Blackwell.

Compston, Hugh (1997) *The new politics of unemployment*. London: Rout ledge.

Cosgrove Sacks, C. (1999) *The European Un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Macmillan.

Cerny, Ph. (1990) *The changing architecture of politics: structure, agen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state*. London: Sage.

Crepaz, Markus M.L. (2001) "Veto Player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distributive Capacity of the State: A Panel Study of 15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21(1): 1-22.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Dr. Mullard, M. and Mr. Lee, S. (1997)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olicy in Europe*.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European Commission (2000) Kingdom Of Spain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Employment 2000.

Farrell, Mary (2001) *Spain in the EU-The Road to Economic Convergence*. London: Palgrave.

Fishman, Robert M (1990)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 and the return to democracy in Spai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os, José María Ordeig (1993) *El Sistema Español de Seguridad Social y el de la Comunidad Europea*. Madrid: Editoriales de Derecho Reunidas.

García Fernández, Manuel (2000) *Introducción al derecho del trabajo y de la seguridad social*. Madrid: MC Graw Hill.

Garrett, G.(1998) *Partisan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Great Britis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ul, Jordi (1996) *The social challenge of job creation-combating unemployment in Europe*. UK: Edward Elgar.

Gillespie, R. (1996) "The Spanish Socialists". In: John Gaffney (ed.)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Routledge, pp. 155-169.

Harrison, Joseph. (1995) *The Spanish economy-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Great Britis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1985) *The trade situ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Spain*. Geneva: ILO Mission.

Jimeno, Juan and Toharia, Luis (1994) *Unemployment and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Spain*.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Katzenstein, Peter J. (1985)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US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itschelt, Herbert (2001) "Partisan Competition and Welfare State Retrenchment: When Do Politicians Choose Unpopular Policies?". In: Paul Pierson (ed.)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65-302.

Korpi, W. and Palme, J. (2003) "New Politics and Class Politics in the Context of Austerity and Globalization: Welfare State Regress in 18 Countries, 1975-9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3): 425-46.

Ladrech, R. and Marlière, P. (1999)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History, Organization, Policies*.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Lucio, M. M. and Blyton, P.(1995) "Constructing the Post-Fordist State? The Politics of 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 in Spa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London: Frank Cass: 18(2).

- Mangen, S.P. (2001) *Spanish Society After Franco: Regime Transi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Palgrave Press.
- Maravall, J. M.(1993) "Politics and policy: economic reforms in Southern Europe"  
In: Bresser Pereira(ed) *Economic reforms in new democracies: a social –democratic approach*.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7-131.
- Maravall, J. M. and Fraile M. (2001) "The Politics of Unemployment: The Spanish experienc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Nancy Bermeo(ed.) *Unemployment in the New Europ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91-328.
- Moreno, L. (2001) "Spain, a Via Media of Welfare Development". In: Peter Taylor-Gooby (ed.) *Welfare States Under Press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100-122.
- Partido Socaillista Obrero Español (Nuevo politico: nuevo tiempo, *History*, (<http://www.psoe.es/NuevasPoliticlas-NuevosTiempos/home.htm>), 12 Jan 2001.
- Pérez, Sofía A. (1999) "Understanding the failure of socialist economic policies in Spa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London: SAGE, 32(6): 659-679.
- Pierson, C. (1991)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welfa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Rodrik, D. (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 Washington, D.C.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1999) *The new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making openness work*. Washington, DC: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 Ross, F. (2000)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New Partisan Politics of Welfare", *Governance* 13(2): 155-183.
- Salmon, K. (1995) *The modern Spanish Economy-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into Europe*,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Pinter.
- Scharpf, Fritz W. (1991) *Crisis and Choice in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chmidt, V. (2002)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European Pathways to Adjust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Labour Market in Spain(1993) *The Growth Phase 1986-1989*,

( <http://www.docuweb.ca/SiSpain/english/economy/growth.html>).

The Labour Market in Spain(1994) *The end of economic expansion 1990-1992*,

( <http://www.docuweb.ca/SiSpain/english/economy/labour.html>).

Toharia, L. and Malo M. A.(2000) “The Spanish Experiment: Pros and Cons of

Flexibility at the Margin”. In: Gosta Esping-Andersen and Marino Regini

(ed.) *Why Deregulate Labour Marke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nidad de Políticas Comparadas (CSIC)-- Documento de Trabajo 00-06, *Ideas,*

*instituciones y ciclo económico: las políticas de formación en*

*España*,( <http://www.iesam.csic.es/doctrab/dt-0006.htm>), June 2000.

Zablaza, Antonio(1988) “El impacto macroeconómico del presupuesto de

1989.”*Hacienda Pública Española* 112: 45-52.

(1989) “Crecimiento, empleo, y política fiscal en la CEE y en España.” *Papeles*

*de Economía Española* 41: 29-36.

(1991a) “El sector público español ante el mercado único.” *Papeles de Economía*

*Española* 48: 37-49.

(1991b) “La política fiscal y las demandas sociales en el presupuesto de 1991.”

*Presupuesto y Gasto Público* 4: 31-42.

